

一 我与《论语》

在去年八月里，王维诚先生和我相约，要我和儒学会的各位谈一次话，但因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转眼四五个月，始终没有实行。

上星期，王先生又提起这事。我问知儒学会不过有五六位会员，便约定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我家里谈一谈；但恰好前两周正为几位担任一年级国文的朋友述说我为本校一年级国文选一书选定《论语》十章的经过，假定他们几位也高兴参加，我家里便坐不下。因此和王先生商量，不如找一个教室，公开谈一谈，也许有些别位同学高兴来听。这便是今晚讲演的由来。

我根本不懂哲学。儒学呢，至今也还没有懂。本不配来说话。但儒书毕竟读过一些，因此定了这个题目，想把自己读《论语》的经过，向各位报告一下，或者比较切实些。

我同《论语》见面很晚，因为先父深恶无实之学，一心期望我做一个好的中医。所以我发蒙读的书是《王叔和脉诀》，而不是三、百、千、和《大学》，《中庸》。直到九岁上才读到《论语》，又因幼时多病，直到十二岁才算把《论语》读完。又读了《孟子》和半部《诗经》，便离开家塾，进了学校。这时对《论语》的印象，是只觉得和平简易，不如《孟子》的大气包举，剑拔弩张，此外就没有什么了。

十四岁进了中学，在同班中比较算年纪小的，但功课并不比年长的同学坏。在小学时考试争第一的恶习，这时候又移到

中学里来了。却不料有一位姓叶的同学，年纪比我还小一岁，但是聪明绝顶。作的很好的柳文，写一手极漂亮的成亲王小楷，说一口好英文。两个人都自以为稳拿第一，便闹成各不相下。论天资我比他差得远，但我的图画手工成绩比他强，平均下来，第一还是落在我头上。因此两个极要好的朋友，却终日因互嫉而吵嘴，闹得地覆天翻。

同班中还有一位姓王的同学，名讷，字畏愆，人如其名，是一位极笃实长厚的青年，我们大家都以兄事之；对于我们这种偏嫉浮器，常加规正。但有时闹的太利害了；他便默不作声。

这一年大概是民国四年吧，我十六岁。夏天将要放暑假的时候，我同叶又闹起来了，这一回闹得很凶。下午放学的时候，王畏愆过来和我说：“我送你一段路吧。”我点点头，便同他一齐走出校门。

我的中学母校在北平东城史家胡同。学生一律走读。我家住东四牌楼北，王畏愆则住崇文门外。每天照例是在史家胡同西口分手，各自回家的。这一天他陪我向北走，我沿途还是絮叨着叶的问题：某一句话分明是嘲弄我，某一个动作分明是揶揄我，说个不休，而他则始终不作声。

走到东四牌楼，他站住了，说：“我不能送了。”那面容非常严肃。接下的一句却是：“你念过《论语》没有？”我答道：“我念过的呀。”他更严肃了，厉声说道：“记着，不逆诈，不亿不信。回去吧。”说完，转身向南，岸然道貌的走了。

我像触了电，半天动不得身，也不知是感激，还是忏悔。最后一溜烟跑回家，马上把《论语》这一章翻开，正襟危坐的对着书直到更深。

从这一次开始懂得了读书要引归自己，在我为学的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纪念，终身不敢忘的。只可惜这两位好友，在二三十岁左右，却不幸先后夭亡了。

此后《论语》便成了我的老师，生活上有了问题，便在《论语》中求解答，得益之多，不可言喻。假如能守而勿失，是不会像后来那样荒唐失措的；不料习气深厚，本根浅弱，十七岁后，又复走入了歧途。

十七岁的夏天，忽然发心要读《庄子》。便找了一部郭注，连注点读。但无论如何不能懂，一个暑假中，从头到尾点了七遍，结果还是不懂，只好放下。同时又爱上了陶诗，长夏无事，在我那一间槐阴深覆的小书屋里，念着“孟夏草木长，绕树扶疏”，觉得在我读过的书中，除《论语》外，最亲切有味的，要算陶诗了。

十八岁进了北大文科国文门，真有点目迷五色。这时国文门完全是余杭章氏学风，《国粹学报》差不多是同学们课外必读的读物。我自己呢，在图书馆的贵重书库中，又爱上了广仓学窘出版的王静安先生的著作。在外面，《新青年》和《新潮》两本杂志，又正在风行一时。我对于哪一方面都喜欢，同时对于哪一方面也不满意，成了“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物”，内心苦闷万分，直没有个解决处。就是这样过了三四年，当中算是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碰着我的问题，但我对梁先生所讲，并不能完全了解。这三、四年中，尽读周秦诸子，结果除了增加些浮泛见解以外，了无所得。

二十一岁这一年，苦闷到几乎要自杀，却遇见了一位学佛的朋友，劝我念佛修净土。我欣然接受，从此茹蔬持名，一下去便是九年。

从此热心于居士生活，寺庙讲筵，几无空过。先后听的看的经典，却也不少。实际上，恐怕只是记了许多名相；但有一天无意中翻《庄子》，却似乎比从前明了了许多。

这一似乎明了可就坏了。靠了自己一点浮明，便在我教书的学校中，大讲其《庄子》。话越说的圆，越自鸣得意，而狂妄亦

愈甚。粗疏廓落，唐大虚骄，真可算诸恶毕备。二十七岁这一年，又参加韩德清居士所办的三时学会，听讲瑜伽，解深密，学得了许多分析名相的知见。虚骄之外，反转又加了吝私。

我一直未出国门，二十八岁这一年，忽然有机会代表一个学会出席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也顺带参观了几处日本寺院。旧习难除，在京都和名古屋，搜集了不少日本人做的关于因明的书，预备回来和别人夸多斗胜。但这一次旅行，亲见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处心积虑，和中国人自己的糊里糊涂，两相比照之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已不大敢再游心于浮妄的空谈了。

这一年正是民国十六年，大多数朋友都已南下。我也在十七年的春上，从北平到了南京。

到南京第一件事是到支那内学院参拜欧阳竟无先生和吕秋逸先生。这时我心中已另有了许多新问题，欧阳先生短短的谈话，我并不能十分领略。十七年的秋末，我便由上海到了广州。

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三年中，对于我十年来的生活态度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时梁漱溟先生正在广州主办省立第一中学，梁门诸子都是笃行不务外一流，尤其是亡友王平叔先生维彻，益我最大。他的言论恰好针对了我的病痛。闻过的机会愈多，反省的心也愈真切，往日不自觉知的毛病，这时才又慢慢的发见出来。

尤其是数年来从北到东，从东到南，见闻所及，学得了很多的事情，于实际问题，颇有所见。但积年锢习，必待碰了大钉子才肯回头。

中山大学国文系有一门课程叫诸子文，我到中大这一年，便开始由我担任。第一学期当然讲《庄子》，靠了从前的那一套狂妄，居然引了许多学生来听。第二学期讲《老子》，依然说得天花乱坠。第三学期讲《荀子》，已经觉得有些吃力。第四学期

居然大胆讲《论语》，这一回算是给了自己一个绝大的教训。

话又说回到几年以前，在民国十四五年的时候，我因为看了阮元《揅经室集》里的《〈论语〉论仁论》，黄以周的《经训比义》，陈澧的《汉儒通义》，刘申叔先生的《理学字义通释》，有所启发，便把《论语》中关于论学、论礼的话类抄起来，拿来解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自谓训诂颇有义据。其实对于这一章全未了解，结果害得梁漱溟先生从北平西郊大有庄跑进城来，亲自登门下问，以为我真懂这一章，直闹得我手足无措。现在既要教这书，便把这一套老家当搬出来，编了一种讲义叫《论语本证》，意在以本书证本书，不至于跑野马。孰知刚刚上了一点钟，便自觉有些说话实在多余。以后每上一点钟，便自觉话越多越讨厌。一再减损的结果，只好光念本文。学生听了兴味索然，便相率退席。讲到末了，师弟交困，勉强收场。

这一回使我深切感到儒学要在力行亲证，决不许你徒腾口说。凡在别的子家可以应用的知见言说，到《论语》全用不上。真是一钉一板，毫无走作，全身毕现，直下承当，才许你入得几分。二十岁前后养成的浮华积习，辗转十年，才算又得到一番忏悔。

民国二十年夏回到杭州住了一年，适其时熊十力先生住在湖上，正在写《新唯识论》。马一浮先生则本来住在杭州。暇日常到两位先生处去请益，这一年受益最大。这一年才把宋明理学书，和清代大儒的书，检重要的粗粗读过一遍。而朱子和曾文正两家，感我最深。因为我一向的毛病，是最不细密，最不着实的呀！

二十一年秋回到北大，改任文学史和诗词方面的课，这对于我是最好的寡过之道，因为教文学史和诗总不会怎样惑世诬民。十年以来，和朋友们也不大谈这一方面的话；除了二十七年秋在蒙自讲过一次《孟子》以外，很不愿把此学作为一场话

说，一方面自己也实无把握。前年，大一国文委员会选定教材，大家推我选《论语》，这才又把从前的《论语本证》稍加删汰，便是现在大一国文选里的《论语》十章。直到前两周为担任大一国文的各位说《论语》，才有今天这一次讲演。屈指三四十个年头，为了自己习气深厚，根器浅劣，不肯着实向学，因循自误，走了许多冤枉路。到如今愆尤丛集，寡过未能，一部《论语》对于我竟无真实受用，真是惭愧万分。

到了今天，对于《论语》一书，实在还没有懂；也就是对于儒学没有懂。不过感想所及，有几点是值得提出来说的：

儒学是求仁得仁之学。要在力行，才有入处。大家如能在躬行日用上改过迁善，反己立诚，以体验所得，反求之《论语》，那便终身受用不尽。否则入乎耳出乎口，仅作一场话说，纵令不是仰天而谈，也于自身全无交涉。

圣人之言，决无偏小，一言一字，当下皆圆。即如“学而时习之”一句，便是彻上彻下，无欠无缺。了得此句，便是一圆一切圆，更无短少。切不可私心摆布，谈什么哲学体系，构画搏量，自塞通途。

圣人之心，与天地参，周流六虚，旁行无碍，识得此意，全局皆活，更无一物死于句下。一切进退因革，质文损益，如指诸掌，百世可知。意必固我之私，须知皆是障道之具。

学者要紧先取“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章，和“颜渊喟然叹曰”一章，互相参照，反覆玩味。且莫高谈性兴天道，先认得孔子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和叹息颜渊的话“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两章，便知好学二字，即已超凡人圣。才说下学，便是上达，更不须别寻门路。方知《论语》之记者，首着“学而时习之”一句，具有深意。大家且先办取一个真切志学的心，以后工夫，自不难水到渠成，迎刃而解。切不可好高骛远，舍己耘人，耽误了切己工夫。这是我一

点很恳切的意思。

今晚随想随谈，有许多词不达意，疏谬之处，希望各位指教。

三十一年一月十七日在西南联合大学儒学会讲

二 儒家的根本精神

一个民族的文化，必有其根本精神，否则这个民族便无法存在和延续。中国民族，两千多年以来，虽然经过许多文化上的变迁，但大体上是以儒家的精神为主。所以，中国民族的根本精神，便是儒家的根本精神。

儒家的根本精神，只有一个字，那就是“仁”。说文解字说：“仁，相人偶也。从二人。”这个字在西周和春秋初年，还没人特别提出来当作为学做人的标目。到了孔子，才提出来教弟子，所以《论语》一部书里，弟子问仁的话特别多，孔子许多不同的答话，对仁的义蕴，也发挥得最透澈。仁就是孔子的全人格，两千多年以来，中国民族共同的薪向，也便是这仁的实践。

《论语》里记孔子论仁的话，最简单扼要的莫如答颜渊的一句：“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就是克去一己之私，复礼就是恢复天理之公。因为人性本善，人格本全，只为一己的私欲所蔽，陷于偏小而不自知，便有许多恶行出现。有志好学之士，欲求恢复此本有之仁，便须时时刻刻做克己复礼的工夫。及至己私克尽，天理流行，自己的本然，也就是人心之所同然，自己的全体大用，也就是宇宙的全体大用。则天下不期同而自同，不期合而自合，所以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但这为仁的工夫，只在日常的视听言动之中，并非在生活之外，别有所事。所以颜渊请问其目，孔子答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因为闲邪存诚，是克己的根本工

夫；学而时习之，也便是实习此事。到了大段纯熟绵密，便可以“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达于君子的境界了。颜渊在孔门是最纯粹的，所以孔子称赞他：“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吾见其进，未见其止。”其实颜渊的得力处，只是让一息不懈的做收敛向里的工夫。这才真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了。

克己的工夫，第一在寡欲，《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一章，说得最亲切。因为一切的欲，都是由躯壳起念。心为物累，便会沾滞私小，计较打量，患得患失，无所不至，毁坏了自强不息的刚健之德。所以孔子批评申枋，说：“枋也欲，焉得刚？”又说：“刚毅木讷近仁。”盖不为物累，便能洒脱摆落，活泼新鲜，使生命成为天理之流行，与宇宙同其悠久。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己重乎？死而后已，不己远乎？”

能克去外诱之私，便能深根宁极，卓尔有立，所以木有似于仁。孔子称赞颜渊，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盖心不外驰，自然有此气象。孔子和左丘明都是讨厌“巧言令色足恭”的，就因为他“鲜仁”，所以仁者必讷。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讷。”曰：“其言也讷，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讷乎？”因为仁是由力行得来的，所谓先难而后获，所以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到此才知一切言语，都是浮华了。

克己的最后境界是无我，《论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是揣量，必是武断，固是固执，都是意识所行境界中的妄念，因为私欲作主，便尔执持不舍，攀缘转深，把一个活泼无碍的生命，弄得触处成障。而其总根源都由于有我。因为我是因人而有的，人我对立，便是自己浑全之体的割裂，缩小，割裂缩小，便是不仁。所以克己不但要克去外诱之私，而且

要克去意念的妄执；不但要克去意念的妄执，而且要克去人我共起的分别见。到了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大用现前，人我双泯，体用不二，天理流行，这才真是复礼，真是得仁了。

孟子教人在怵惕惻隐之发见处识仁，因为仁以感为体，他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寂然不动便是静虚，感而遂通便是动直。内外无隔，有感斯应，如水就下，如箭在弦，所以仁者必有勇，仁者必敏。静虚之极至于无我，则死生得失不介于怀。动直之极至于自他不二，则不达于得仁不止。所以君子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是极从容自然的事。到此境界，只有内省不疚，是惟一大事，此外都无忧惧，心境自然坦荡平愉了。

无忧无惧，便是知命乐天，孔颜乐处在此。到此境界，岂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是素位而行，无人而不自得，圣人之从容中道盖如此。然究其极，亦只是作到了尽心率性，并非于人生本分外有所增加，极高明亦不过道中庸而已。

这便是儒家的根本精神。我民族二千年来涵濡于这精神之中，养成了一种大国民的风度。那便是寡欲知足，自强不息，爱人如己，敏事慎言的美德。我民族所以出生入死，百折不回，屹然立于不败之地，全靠了这一副哲人精神为其自信力。发扬这一种精神，便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信念，是我民族的责任，应该当仁不让的。

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昆明广播讲稿

三 论为己之学

《论语·宪问》篇：“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朱子《集注》引用程子的话道：“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又说：“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愚案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

一部《论语》，论其宗趣所归，一仁字足以尽之；论其致力之方，一学字足以尽之。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是仁亦涵摄于学。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的记者，也拿“学而时习之”一章冠首。这真是原始要终，彻上彻下，明白了为学之道，便已本末兼赅了。

人之大病，莫过于昏惰无耻，孔子只有对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的两种人，说他们“难矣哉”！又说：“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孟子也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因为为仁是由己的，如果你志趣凡下，不耻卑污，那末，人都不奈你何。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又说：“不口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孟子也说：“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朱子也说过：“不带性气的人，为僧不成，为道不了。”所以“尚志”是学者第一件大事。

尚志便是自强，鞭辟近里，与他人全无干涉。所以《孟子·答王子垫问尚志》说：“仁义而已矣。”如不善会此意，便有以伎

求为尚志的，有以妄想寻伺为尚志的，行险侥幸，病目空花，而自以为有志，这正是孔子所谓“患得患失”的鄙夫。学者如能于此处体认明白，则其一段高明俊迈之精神，必有自发而不容己者，这样为学，才是为己之学了。

《荀子·劝学》篇有两句话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真说到为己之学，不但不为禽犊而已，凡逐外徇物，皆是为他人。学者且各自问：我今日为学，果真为谋道，不为谋食吗？果真不为名利恭敬吗？果真有一段不容己之精神，坦然奔赴，宁以穷饿无闷，死生不变其操吗？如其未然，那便是实在未尝有志于学，入手便错，何问前途？且教洗髓伐毛，将自欺欺人之习，打扫净尽，实见得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实见得己之所以异于圣贤，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不怙己过，不恋旧习，才可与说为己之学。

孔子答子路问志，只说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自述则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此言最为无病。学者虽不驻外，但是空悬鹄的，模画圣贤，也便是捕风捉影。如文王之“望道而未之见”，颜渊的“如有所立卓尔”，都是实有所见，才说这话。不然，误会了孟子“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的话，或且预立目标，以与古人铢量寸较，反转变为功利炽然，仁义充塞，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只一句“好学”，便是万病尽祛，万行具足，才真是为己之学了。

为己之学只是自知不足，而未尝预拟其止境，这便是下学工夫，至于上达，是不暇计及的。孔子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称赞颜回，说：“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这都不过真是“日知其所亡”而已。真能日知所亡，必能月无忘其所能，所以颜回是“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的。

不足之感还是由好学而来，所谓“学然后知不足”者是。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知困然后能自强，都是切实向内的工夫。所

谓“反身而诚”，“尽己之谓忠”，实在皆是好学之事。自知不足则其心愈虚，反身而诚则其心愈实，程子尝说：“学者心要实，又要虚。”其意在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实到极处；“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是虚到极处。致实致虚，才真是为己之学了。

真能虚的人必不骄，真能实的人必不吝。真能虚的人必不伎，真能实的人必不求。真能虚则学不厌，真能实则教不倦。而其实则皆是诚之发见处。诚则明，是虚之用，诚则动，是实之用，诚之全，即仁之体。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能触处反求诸己。即是“无终食之间违仁”，能造次颠沛不违于仁，才真是为己之学了。

至诚无息便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即是仁者必有勇，所以真能为为己之学者必是宏毅坚刚，光明俊伟，洒然无累，凝然不滞，夙夜黽勉，而未尝有累于心，无非求有以自得而已。

“自得之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居之安，居之安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所以真能为为己之学者必有及物之功，程子所谓“其终至于成物”者是。因为宇宙内事皆自己分内事，所以仁者与物同体，成物实即尽己之事，仁者并不自知其有及物之功的。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孔子叹其巍巍，舜禹并不自知其巍巍也。反之，视天下有一物未康即亏吾性到是真的。所以成己成物原无二致，其义在此。

否则，竭情利禄，弊力声名，正是《乐记》所谓“物至而人化物”的。己之既丧，成物何由？人生可哀，无过于是！是不可不痛自反省的。

本篇系应西南联合大学三青团刊物《联大青年》的要求而写，写成而《联大青年》已停刊，改送《国文月刊》。原为文言，兹为本集文风一律，改为白话。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改写后记。

四 感与思

关于现在中学生国文程度低劣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专家讨论过了，今晚专就国文作文内容提出两点，略说个人的意见，那就是：感与思。

我们觉得学生作文技术拙劣是比较容易补救的，唯有内容空洞糊涂，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空洞糊涂就证明作者的无感觉或不会表示感觉，无思想或不会运用思想，根本不立，所谓技巧云者，便全是不着边际之谈。教者不能在这里善为培植，学生的作文是无法进步的。就近几年大学入学试验国文卷来看，一百篇作文卷中，未必能有一篇感动人心或启发人思的。叙述描写只会用几句现成套语，析理论事更只会人云亦云。凡曾参加过阅卷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不感觉头痛的。所以致此的原因固然很复杂，然而教者不善教，学者不善学，恐怕是主要的原因。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便成了空洞糊涂的现象。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便是既不能感，又不能思。

今晚这个题目，就是想针对这个问题说几句话。所以只说感而不说感觉或感情，只说思而不说思辨或思想，意在指点出一些实际用功下手处；至于从感到情，从思到想，便不是本题讨论的范围了。

照说，生在现时代的青年，应该是最善感而能思的了。国家民族遭遇着空前的厄运，世界人类正在互相毁灭中，眼见耳闻，无一事不是惊心动魄，无一事不足耐人深思。“殷忧”是足够了，但是否已经“启圣”了呢？只须翻开入学试验国文卷一

看，便可以发现有那么多的青年的作品，木然无感，茫然无思，空洞糊涂，不知所谓，这真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我们承认青年的心都是活着的，其所以有此现象，完全为了教育不够培植他们的性情，启发他们的智力，以致才出土的幼芽，便日就枯萎，这是有教育责任者所应反省自责的。

我们要承认：一个人除非全魂气断，他决不能无感，除非白痴痼疾，他决不能无思。小孩在婴儿时期便会饥啼饱嬉，这便是感；稍长，对于宇宙万类好发疑问，这便是思。年齿日增，便会从切身的感扩充到泛然的感，从具体的思到抽象的思。大诗人，大哲人，也无非由此作出发点。年龄有长幼，经验有浅深，然其能感能思是一样的。如果年龄愈长，愈变成木然无感，或茫然无思，那轻者也是失心，重者即成狂易，是不能不深长思的。

何以有此木然无感或茫然无思的现象呢？第一，是由于愚蔽。《论语·阳货》篇，孔子对子路所说的六言六蔽，仅指不好学之失。到了《荀子·解蔽》篇，历数欲，恶，始，终，远，近，博，浅，古，今之蔽，而总结之曰：“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对于愚蔽之病可谓剖析入微了。大抵愚蔽之患，起初或因知识短浅，见闻隘陋；或因先入为主，固执成见，因而对于相异之境，或相违之说，惮于理会。再加上怙过妒能的心理，如荀子所说“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便对于异己之境，更不屑于究心。久而久之，于此相违相异之对象，亦遂淡忘。宇宙之大，只有那一点便于己者常在目前。如荀子所说：“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况于使者乎？”如《礼记·大学》篇所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即是指此愚蔽的状态。实际上，不能周知遍感的人，对于那便于己之一点，亦未必能有所获，所感所思，不过妄心所造之幻境而已。这样的人在他自己未尝不自觉有感有思。但在旁人眼中，只觉其麻木偏枯，私小愚暗，如古

人所说的“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漠然无所动于中”；如说有白昼攫金于市者，问之，曰：“只见金不见人。”便都是这一类。这样的人，当境了知，和泛应曲当的良能，早不可见了。

本此道理来检讨我们的国文教学，如果教师选材溺于一偏之说，使学生没有比长系短的机会；或命题多强制性，使学生只许复述旁人的话，这便是愚蔽教育。学生的良知良能，日就渐灭于无形，如何还有能感能思的力量！在教师未尝不自矜曰：“我善治马”，而不知“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无感无思之患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戕贼，这在《孟子·告子》篇“牛山之木尝美矣”一章说的最透澈。大抵嗜欲深者，天机必浅，《礼记·乐记》所谓“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最能说明外重内轻的情状。凡背性从习，或委心逐物，最初未尝不受良知的责备；倘不能如陶渊明的“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久之必不自胜。通常所谓习非成是，在日趋偏蔽者不能自知也。孟子有云：“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人到了失其本心，则亦块然一物已耳，尚有何能感能思之可言！如俗说走肉行尸，酒囊饭袋，即言其已经化物。人而化物，虽云未死，同物化也就差不多了。

本此道理来检讨我们的国文教学，如果教师选材溺于功利之说，使学生总是从利害上计较打量；或命题多引起学生的得失之念，使青年养成贪竞之习，这便是物化教育。在这样教育之下的学生，真所谓“民不见德，唯乱是闻”，其溺于小利，蔽于近习，志趋日卑，品格日下，是必然的结果。除身家性命外，尚何所感？除患得患失外，尚何所思？

清儒对于治学有两句常说的话，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青年的心理大都单纯，以己自蔽的毛病较少，以人蔽己的

机会较多。上文所说的国文成绩空洞糊涂，未必全是学生之过，教师的诱导，家庭的习染，社会的熏陶，有形无形中都在助长愚蔽，从事戕贼，使青年尚未发蒙，即遭桎梏。天下惨痛之事，无有过于此者！国文之低劣，不过其着见之一端而已。

但青年却不能以此自恕，把一切过错推给家庭、社会和教师。因为良知、良能，吾生本具，二十岁左右的人，还不知道努力去夫外诱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其人之多欲无刚，已可概见。个人是不能不痛自克责的。

在这里我愿与所有学国文的同学，共同忏悔反省，改过自新，商量一个办法，使我们的生命活泼新鲜，刚健有力，无思不睿，无感不通。庶几乎空洞者化为充实，糊涂者变成明白。敬贡愚见，就正高明：

愚蔽之病的对治，《荀子·解蔽》篇说的最好，其言曰：“故治之要在于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这“虚壹而静”便是先哲对治愚蔽的共同下手处。荀子自己解释说：“不以己所臧（藏）害所将受谓之虚。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又说：“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这便是宋儒所谓“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盖公则生明，明则能照，其在孔子，则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说：“我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其在易传，则咸之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系辞》也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兴于此！”《老子》更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的。《大学》也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所谓空虚，所谓寂静，都是浑然天理的气象。以此感物，则无感不通，于以成同体之仁；以此致思，则无虚不得，于以成遍照之智。其心既虚明光